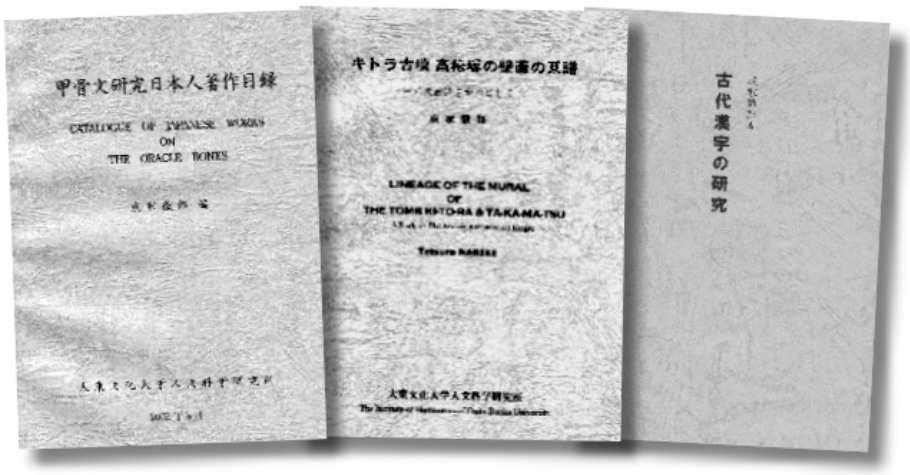
《東華漢學》第 4 期；頁 291–298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6 年 9 月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的研究〉譯介

魏慈德*

成家徹郎（なりけてつろう），日本古文字研究家。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學外研究員、東京書法學院講師。1947年生於青森縣。著有《甲骨文研究日本人著作目錄》、《キトラ古墳高松塚壁畫的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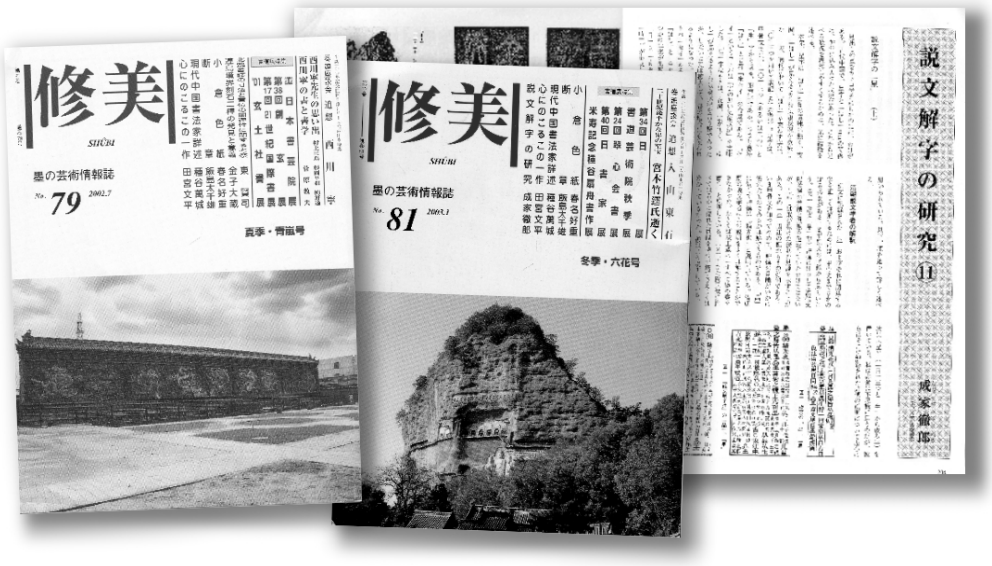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成家徹郎著有《甲骨文研究日本人著作目錄》等書

—以天文畫像為中心的研究》、《古代漢字的研究》、《中國古代的天文和曆法》（以上皆由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等書，以及中英日文期刊論文卅多篇。

以下譯介的是刊於《修美》19卷69號到23卷87號，連載19期（2000.1—2004.7）的〈說文解字的研究〉。



《修美》19 卷 69 號到 23 卷 87 號（2000.1-2004.7）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的研究〉是繼日人阿辻哲次《圖說漢字的歷史》、藤枝晃《漢字的文化史》後，又一綜論漢字形成與演變的漢字學史著作。在〈說文解字的研究〉十九篇中，作者除了介紹《說文》的作者、體例、注本和六書體系外，旁及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交流，包括兩國學者如何在材料的取得與研究上互助及日本學者如何汲於取得中國珍本古籍的過程，還有早期日本學者對漢字發展研究的概況等。另外由於作者具有天文系出身的背景，因此對於古代社會中與天文曆法有關部分，亦多展現其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文略分三點來對〈說文解字的研究〉擇要介紹。

一、有關《說文》古本及漢字流變的研究

作者介紹了今存最早的《說文解字》手抄本，即現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該書在清末時為莫友芝所有，莫氏得到此古本，據言是透過其弟莫祥芝知道黟縣的張廉臣有古本《說文》殘卷，旋命其弟到張處摹寫一本，後來張氏還將該書贈予莫氏。後經與大小徐本《說文》對照後，命名為《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莫氏立刻將此事告訴曾國藩，因當時莫氏兄弟皆在曾國藩幕下，曾國藩便決定立刻出版，即於同治三年（1864年）於安慶行營刊刻，故

《箋異》卷端有曾國藩題字，時間是同治三年八月。

爾後該書流入端方手中，1910年9月內藤湖南與小川琢治、狩野直喜等人受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派遣，來到清國北京學部，調查敦煌文獻和內閣古書時，順道拜訪了端方。當內藤一行人到端方宅邸訪問，並向端方詢及此《說文》木部殘卷下落時，才驚知該唐寫本《說文》正為端方所藏，而內藤也第一次看到了此殘卷的真本。然端方卻在次年的四川鐵路國有風潮中被湖北的革命軍殺害，之後內藤一直打聽著唐寫本《說文》殘卷的消息。當1917年內藤再度來到北京時，才知此《說文》古寫本已轉為端方的親友景賢所有。而1924到1925年間內藤偕長子乾吉及石濱純太郎到歐洲考察之際，突然傳來景賢死去的消息，其馬上派北京的友人去了解該書的下落，後來得知此書要出售的消息時，內藤立即表示要購到的決心，然因京津戰亂之故，內藤購書的信件卻遲了一個月才寄達。其時書已轉賣他人，後來在友人不斷斡旋下，書才被購回。而當時考慮到戰亂郵送的風險，甚至透過北京的日本公使館及外務省的協助才將此書輾轉送到了日本(此點與嚴紹璗在《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96頁中所言不一，嚴氏言木部殘卷乃白堅送給內藤，非內藤自購)。後來這個寫本在內藤死後賣給了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的杏雨書屋。木部殘卷上各紙接合處皆鈐有南宋內府藏書的「紹興」小璽，還有米友仁鑑定的跋、賈似道的印及元人及明代人的印，可知是從南宋末期一直流傳下來的，劉毓崧推斷是唐代元和十五年（820年）的寫本（見《箋異》附寄給劉毓松的「識語」）。今天這個殘卷已

被日本指定為國寶，並曾於1990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的日本國寶展中展出（關於內藤湖南如何得到此古寫本，亦可見《內藤湖南全集．目睹書譚》，東京筑摩書房，昭和45年）。

作者還進一步以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字體和傳世的李陽冰篆書書法筆畫比較，認為兩者書體有異，李陽冰的篆書筆劃較粗且彎曲，唐寫本則收筆較尖且細。並推測其或許是李陽冰校訂時所用的原本（關於此點李家浩曾於〈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為李陽冰刊定本考〉《文史》2003年第1輯中，認定唐寫本是根據李陽冰刊定的《說文》抄寫的）。

在漢隸的介紹方面，作者舉了1930年以斯文赫定為首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所得到的居延漢簡為例，詳述了這批漢簡的發現及輾轉易地保存的經過，其中還談到了大庭脩捐助印行《居延新簡》一事，乃因其師森鹿三生前曾經感嘆地說到，「在這批木簡（居延漢簡）照片圖版的印刷過程中曾經二度阻礙了木簡出版及研究的那些人，能否設法作些補償呢？」因此於1970年同一地方又大量發現簡牘，並以《居延新簡》為名出版時，大庭脩就對書的出版作了資金的援助，以實現恩師的遺志。

在六書的介紹方面，作者首先批判了唐蘭的「三書說」，主張指事一體不能偏廢，並舉了大地灣仰韶文化遺址上的陶器文樣及河姆渡遺址上的陶器刻符符號為證，認為指事字即出於這些抽象的幾何紋樣。而早期象形字部分則舉中國內蒙古陰山及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山發現的岩畫為例，認為漢字起源當有指事、象形兩個源頭。

形聲字部分，作者則批評許慎未能注意到形聲字聲符的表意功能，主張聲符才是形聲字表義的所在。並引藤堂明保的說法舉例說明，如藤堂氏以為旦、袒、綻、誕、丹，皆音タン，義皆可通。如「旦」即日從地平線上出現，「袒」即衣破肌膚露出，「誕」為小兒子從母體中出生（《漢字語源辭典》），皆有露出之意。然作者也進一步從甲骨、金文字形著手，批判了藤堂氏的說法，如認為甲金文中「旦」字不從日下一橫，而作日下一方框，證明「旦」的構形非日從地平線上升起，而當是「從日丁聲」。對於許慎《說文敘》所舉形聲例字江河二字，作者則以為江從工聲，「工」有貫穿之意；河從可聲，「可」有屈折之意。

二、有關日本學者的文字學的研究

在日本學者的文字學研究方面，作者批判了阿辻哲次所說的《說文解字》是非科學，是迷信的產物的說法（〈《說文解字》和甲骨文字〉《しにか》1999年4月）。以及對1970年白川靜和藤堂明保的漢字起源論爭辯作了介紹，其起因於白川靜該年於岩波書店出版《漢字的起源及其背景》一書，同年岩波書店發行的《文學》雜誌七月號上刊載了藤堂氏的書評，其對白川靜的漢字研究方法提出了強烈的批判，白川靜認為文字的產生與王的權威有關，主張從宗教的儀式或精神的角度去探求文字本義，而藤堂氏則反對這種方法，主張文字的本義當從文字所從聲音

的角度去探求。

此外還介紹了島邦男的甲骨文研究過程，其引赤塚忠在《甲骨學》第十二號中對島邦男的追悼以及島氏在《殷墟卜辭綜類》緣起中所提及的，當年島氏在學生時代曾聽過宇野哲人說甲骨文是偽造的，引起了他研究的興趣，後來在研究上帝神格問題時想從甲骨文入手，因此去拜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受到其言美國人研究日本語方法的啟發，編了《殷墟卜辭綜類》。

還見新城新藏和飯島忠夫關於干支起源的研究，新城氏出身於東京帝國大學物理系，後任京都帝國大學校長，在1920年時發表〈干支的起源〉及〈關於十二生肖〉，飯島氏則於1927年發表〈關於干支的起源〉。其論文發表之際皆在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階段，而且兩人皆不相信甲骨文是真物。飯島氏還曾寫過〈殷墟文字的批判〉，主張甲骨文是戰國時代的東西，因此他們在探求干支字的字源時，只能根據《詩經》、《史記》、《白虎通》、《說文》等書來對干支的字義作猜測。其中飯島氏為日本中國學東京學派學者，其不僅主張中國的先秦古典作品都是後人偽造，還認為中國的廿八宿及天文學都是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

三、有關天文學方面的研究

在天文學的研究方面，其對「朔」、「星」的字義提出獨到的看法，如認為朔的本義是「迎」，「朔」是「迎接月」的意思。因朔時太陽與月亮合（即在同一方向），故看不見月。所以古人以朔為初一，造出以「合」（太陽和月亮同方向）為月首的曆法。又《說文》以為「星」為「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作者則認為星的本義並非星星，在甲骨文中星的意思是夜間無雲可以看到星星的狀態，後來演變成了星星的專用字。

而對《甲骨文合集》11503反的「新大星並火」一辭，作者以為是超新星與大火（天蝎座α）並列之現象，認為這是商代的一次超新星紀錄。

在廿八宿與四靈獸的研究方面，作者認為曾侯乙墓上廿八宿名中北方玄武七宿中有「東縈」、「西縈」而無「壁」，因此當是廿七宿而非廿八宿。因為月亮約廿七日繞天上一周，而這廿七宿的觀念正是從印度傳來的。在春秋後期的配當思想出現後，出於將天上星座四等分要求，因此將縈星分為「東縈」、「西縈」，後來才又將「西熒」稱為「熒室」，「東縈」改名為「東壁」，之後更基於要用一字來稱呼各星宿的要求，就變成了「室」和「壁」。而與廿八星宿相配的四靈獸，從曾侯乙墓出土衣箱篋上廿八星宿名和龍虎圖看來，龍虎二獸的出現早在紀元前五世紀就已形成，先蒼龍後有白虎，蒼龍來自對心宿大火及角宿的想像，白

虎因與蒼龍形象的相配而來。後又加入朱雀、玄武，前者來自與龍虎等的相配想像，後者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龜蛇格鬥文樣裝飾圖像的啟發。而作者還介紹了日本今日可見最早的星圖四靈獸及十二支獸墓室壁畫，即奈良縣明日香村キトラ古墳高松塚內的壁畫，其墓的時代約在西曆700年左右，約中國的初盛唐時。今載十二支獸最早的出土文獻為睡虎地秦簡《日書．盜者篇》，證明戰國晚期十二支獸的概念已形成。

而在木星紀年法的研究方面，作者主張其源自印度的木星占星法。並舉大西正男的研究成果 (《十干十二支成立的研究》) 認為太歲紀年的歲名來自藏語，如攝提格即藏語中虎的意思，單閼、執徐、大荒落以下分別為為兔、龍、蛇等藏語的音寫。

此外，還指出了首位提出中國古代所使用的曆法是大火曆的學者是島邦男。但是島氏的研究並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因此作者加以闡述，以為中國人所謂的「火」又叫「大火」，因大火在初春時於日没之際正好能從東邊地平線上見其昇起，因此其出現被用來當作一年農作的開始。商代就是利用大火年週期這樣的一個指標，因而把大火初見於東方之際當作春季開始，也就是一月。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以冬至為指標的新曆法出現了，也即周曆，而因為先秦文獻大抵都是根基於周人曆法觀念所寫，因此後人誤以為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使用周曆。但若從古文獻和與農業有關的記載作一深究，就可以發現很多地方無法用周曆來解釋，而若從以大火為指標來考慮的話就很容易理解。而島邦男首先從季節和月名的關係來研究，確認古人所使用的是大火曆。其是以春天為正

月的，因此到了以冬至為月首的周曆時，便令人使用起來感覺不便。因此與大火曆一樣以一月為農作業開始的曆法，也就是所謂的夏曆，就被制定下來了。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rike, Tetsuro's "Study of shuowenjiezi"

Tzu-Te Wei

Keyword：Narike, Tetsuro　shuowenjiezi

（責任編輯：郭欣怡）